

从经验心和超验心看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的会通

乔凤杰

(河南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中国古人的实用理性,以及把所有领域事情全部纳入做人视阈的思想观念,使传统文化对中华武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传统文化对中华武术的影响,可从经验心与超验心两个层面进行思考:传统文化各家所推崇的超验心的具体表现,如儒家的道德规范、道家的为人策略与养生技术、佛家的禅定方法、兵家的作战思路等,对于传统武术来说,乃是可以提升习武者主体经验心的最佳方法论;传统文化各家之开发与彰显超验心的方式,乃是传统武术构筑与提升其功夫境界的基本思路。阐释了传统文化对中华武术影响的现代意义,并对中华武术发展中某些敏感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关键词: 中华武术; 传统文化; 经验心; 超验心

· 中图分类号: G80; G8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05)03-0073-04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martial art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mental mind and super-experimental mind

QIAO Feng-jie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sense of practicality, as well as the ideological conception that includes things in all areas into the domain of personal behavior, have driven traditional culture to produce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Chinese martial art.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n Chinese martial art can be comprehend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mental mind and super-experimental mind: For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the specific expressions of experimental mind highly recommended by all sor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such as Confucian moral code, personal behavior code and health keeping technique of Daoism, Buddha's meditation method, battle tactics of tacticians, are the best methodology that can promote martial art practitioner's principal experimental mind; the ways employed by all sor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o develop and highlight super-experimental mind are the basic clues for building traditional martial art and promoting its Gongfu level. The author expounded the modern meaning of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on Chinese martial art, and carried out in-depth contemplation on some sensitive realistic issues exis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

Key words: Chinese martial art; traditional culture; experimental mind; super-experimental mind

生长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的传统武术,受到了来自于大传统和小传统诸多方面的影响。对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之关系的全面研究,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非笔者目前的学力所能及。笔者这里所关注的,乃是儒家、道家、佛家、兵家等主流文化形态对传统武术的影响。

1 传统文化何以能影响武术

“不是先验的、僵硬不变的绝对的理性(rationality),而是历史建立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系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它即是历史理性。因为这个理性依附于人类历史而产生,而成长,而演变推移,具有足够的

灵活的‘度’。……‘实用理性’不以自身为自足的最高鹄的,相反,它清晰地表明自己作为人类生存的工具性能:在实用中证实理性对于人类生存确乎是有用的和有益的。”^[1]

李泽厚先生^[1]中肯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根本特性。这一实用理性,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后来又为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德加以提升与强化。这一根深蒂固的、很难用优与劣轻易定性的实用理性,使诸多在外人看来与传统武术风牛马不相及的文化形态,却与传统武术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正是这一根深蒂固的实用理性,使传统武术家们在对待其他形态文化时,绝不会以封闭的、原有的技术逻辑为最高鹄的,而是一切以实用为依据。这样一种

生存意识极强的实用理性,使传统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从其他形态文化中所吸收到的营养,远非其他民族同类项目所能比。这就使我们在研究传统武术时,绝不可以对传统文化之影响有丝毫的轻视。

政治上的高度集中与经济上的高度分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矛盾^[2]。总体看来,儒、道、佛三教乃是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即使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人们也要在三教中寻找精神的安慰。三教的思想是中国古人所必需的,那么,作为传统文化形态之一的武术,也必然地把其作为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在中国古代社会大背景下,三教思想进入武术是必然的;三教思想对武术产生深远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一直非常发达但却总是以隐形式流传下来的兵家文化,虽然并不被官方作为显学大肆宣扬,但是,它对中国古人思想意识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儒、道、佛三家。更何况,在传统文化中,武术与兵家,从目的到手段,从核心到外围,都是非常接近的。因此,武术与兵家在思想方法上的必然联系,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把所有领域的事情,全部纳入做人的视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在中国古人看来,任何技术与知识都没有特别重大的独立存在价值;如果不以做人作为最终目的,任何技术与知识的研究,就都失去了意义。在现代看来可以与做人严格区分开来的诸多事情如技术、认知等,在被强行纳入做人的系统以后,也就只能成为其成就完美人格的一个过程与手段。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是做人的文化。这种思想观念的支配,使武术与其他形态文化非常自觉地统一到同一个体系框架中。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支配下,发展专业技能,只是传统武术的基本任务;而成就理想人格,才是传统武术的根本目标。

2 传统文化对武术的影响

传统文化对中国武术的影响,可从经验心与超验心两个层面进行思考。

所谓的经验心,即是平日我们常执持为自我的主体之心。它是相对存在、不断变化的心识流。这一主体心的确立,使自我与外界区分开来;自我与外界的关系,也就变成了我们所常言的主客二元的对立关系。正是由于这一作为主体的经验心的存在,才因此产生了丰富多彩的作为客体的现象世界,而无论我们怎样对这一作为客体的现象世界进行价值判断。在主体之经验心的外部,必然只能是作为客体的现象世界。也就是说,经验心所能认知的,乃是一个非物自身的现象世界。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所谓的经验心,即是儒家的人心、道家的机心、佛家的染心等。

所谓的超验心,乃是人的本我,或曰人的真实面目。它是绝对存在、永恒不变的根本智慧。这一实是人之本我的超验心,没有对个体经验心的自我执持,因此也就没有所谓的自我与外界的主客分离。超验心的知识是自明的。超验心所自明的,乃是一个物自身的世界。也就是说,超验心所自明的,乃是全部真实的物自身的世界。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

言,所谓的超验心,即是儒家的本心、诚、太极、良知等,道家的道心、道等,佛家的净心、真如、般若、佛性、根本智等。

经验心与超验心是同一人心的层次不同的两种表现,并不是说每个人都真实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心。经验心是我们在处理与外界的各种关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经验心的存在,必须通过与他者发生关系而得到证明,因此,它必然是一种在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逻辑主体。超验心即是真实的人心。超验心的存在,是我们这些缠绕于各种关系中的经验之人所无法理解与体验的,因为它本身即是一个本真的、不依赖于任何外界关系、主客不分的诸物自明之心。以最高层次的超验心对物自身的把握,要远远优于以一般层次的经验心对现象的把握。在中国古人看来,人的实践能力的差别,其实即是主体心之实践智慧的差别;而人实践智慧的差别,固然有同一层面的经验心的量的不同,而最根本的则是经验心与超验心之不同层面的质的界分。在传统武术家们看来,习武者的武术实践能力的层次性差别,也就表现为实践主体之经验心与超验心的不同。

对于平常人来说,在我们不断地运用经验心发挥自己的经验智慧时,那个本真的超验心即超验智慧,却被我们深深地压抑着。经验心与超验心的划分,正是从我们这些平常人的角度来看的。就概念之准确性的角度讲,经验与超验的划分,其实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对于已经彰显了超验心的圣人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经验之内,其超验心自然也就是一个能量无比的超验心。因此,圣人之超验智慧的经验表现,或者说经验主体所能认知的圣人的实践智慧,也就成为了凡夫俗子的学习典范。

在传统思想中,做人与做事是连在一起的:什么境界的人,就会有什么层次的做事方法,自然也就会产生相应层次的做事效果;而最高层次的能够带来最佳效果的做事方法,必然是超验心的彰显与表现。虽然,传统思想的各个流派对经验现象的态度并不一致,然而,无论他们认为经验现象是虚幻的还是实在的,也无论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是发展的还是堕落的,他们对待超验心的看法,却是基本一致的。本我的超验心,是超越经验的、潜在的、能够直觉物自身的无限心,是“无所知而无所不知、无所能而无所不能”的人体潜能。超验心之超验智慧,不是那种需要在时间与空间中才能使现象得以呈现的感性直觉,更不是那种需要纯粹理性才能决定的知识建构,而是一种没有任何对象化执著的智的直觉。

与整个传统的主流思想路线一致,传统武术对人的潜能的开发,虽要摒弃个人私欲与机巧伪智,以“无化”为手段,以“无”为最高境界,但却并不脱离具体的方式方法;相反,在传统武术家们看来,对人潜在的武术运动方面的各种潜能的开发,本身即是在这些具体的方式方法的练习与运用中完成的。超验心的开发与彰显,乃是在合理的技战术训练和武德践行中通过对个人私欲与机巧伪作的抛弃而实现的自我超越,也即所谓的在实践中的顿悟。传统武术的这一训练思路,与儒家的“致良知”、道家的“道进乎技”、佛家的“转识成智”,是完全一致的^[3]。虽然,超验心与具体方法(即经验心)常常是不一致的,但是,对超验心的开发,却并不是要抛弃方

法,而是对具体方法的超越与提升,是“去病不去法”。

在儒家,既要“道问学”,更要“尊德性”;在道家,既要“问道”,更要“为道”;在佛家,既要学习“善知识”,更要修行“转识成智”。总体看来,传统文化提升人生境界、改善做事方法的两大思想路线,一是效法超验心之具体表现(此已是一种经验智慧)而提升人的经验心,二是通过“无化”而彰显人人潜在的超验心。传统的主流文化对传统武术的影响,自然也需要在此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加以分别。

传统文化各家所推崇的超验心的具体表现,对于传统武术来说,乃是可以提升习武者主体之经验心的最佳方法论。儒家关于成人成圣的礼仪形式与道德规范,是传统武德的主要内容;道教的诸多养生功法与佛教的诸多禅定方法,因其在培养拳手身心素质方面的卓越效果,被很多传统拳种直接引入或者稍加改造而作为了颇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内功法;兵家有关培养作战勇气、掌握对抗主动权、避实而击虚的思想,道家的“反动与弱用”,对传统武术诸多流派的技战术与武德规范的构建,有着非常显著的指导意义。传统文化各家之开发与彰显主体超验心的方式,同时也是传统武术在境界方面的构筑与提升方面的基本思路。传统武术家们乃是通过超验心之具体表现的学习与效法来进行技战术、功法、武德等内容方法等的构建,然后在技战术方法、功法内容、武德规范等的具体训练中“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从而开发与彰显自身潜在的超验心。

儒、道、佛、传统武术等对经验心的提升与对超验心的彰显,我们可以分别以儒家“道问学”与“致良知”来称谓。“道问学”,即对经验心的提升,乃是人类在现象层面的自我建构;“致良知”,即对超验心的彰显,乃是人类自我向存在本体的回归。在我看来,传统文化对中华武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其一,为传统武术的训练确立了最高目标——彰显超验心;其二,为传统武术提供了大量的提升其经验心的优秀实践方法;其三,为传统武术指出了超越经验心而彰显超验心的基本方式。

3 对传统武术文化的理解

对经验心的培育与提升,其实即是一个融百家之长反复磨练的过程,而对超验心的开发与彰显,其实即是一个以经验活动为依托的超级心理训练过程。中国古人异乎寻常的实用理性所表现出来的博大胸怀,使传统武术在技术风格上不拘一格;中国古人对超验心的坚定信念与开发方式,又使传统武术表现出了极为明显的主体内向性的思维特色。这种主体内向性思维不是以自心为对象进行客观的抽象性研究,而是从逻辑的经验心向本真的超验心的回归。通过这种主体内向性的超级心理训练所获得的技能,乃是一种直觉能力。当然,这种直觉,绝不仅仅是一种感触直觉,而是一种智的直觉。完整的传统武术训练,乃是一个从感触直觉到经验直觉,然后再由经验直觉到智的直觉的培育与超越的过程。

超验心的开发与彰显,是一个“无化”的过程,是一个彻底地消除对象化思维、摆脱一切理性分辨的过程。此时的武术训练,具体法本身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而只是其开发人体

潜能时需要凭借的一个外在形式而已。此时的训练,人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具体法,而是集中于个体内在的心理或精神。这就是所谓的传统武术训练的主体内向性特色。这与西方体育重视对运动技术的理性认识与对训练理论的理性构建的思维方式,似乎有着质的区别。然而,当我们思考传统武术的技术风格与训练思路时,也必须考虑其形成机制的复杂性,如运动本身、动作仿生等对武术风格形成的影响等。现代的诸多学者在进行中外同类项目的比较研究时,似乎已经形成一个潜在的思维定式。在他们看来,中国武术所拥有的,国外必然没有;而外国同类项目所拥有的,中国武术一定没有。其实,作为一种很现实的运动实践,由运动机制所决定的从技术实践到技术研究的对象化思维,乃是中外武技之所以存在与发展的共同基础。我们绝不可说传统武术是一种单纯的主体内向性思维,只能说传统武术中存在着主体内向性思维方式,而这种主体内向性思维的存在即是其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标志之一。

在我看来,把事物对象化或客体化,从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中寻找规律,从而研究与确立解决事物问题的正确方法,乃是对对象化思维的实质;实践主体自我反省,着力于开发自身潜能,彰显潜在的超验心,以获得最佳的处事能力,乃是主体内向性思维的根本用意;而对对象化思维与主体内向性思维这两种方向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传统武术中,是长期并存的。对象化思维是我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建立良好的技战术、武德规范及其训练方法体系的根本依据;主体内向性思维,是开发人体潜能、培养习武者技战术运用能力、升华习武者思想境界的重要基础。我们不能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机制而导致的主体内向性思维的存在,就完全抹杀中外武技在技术风格与训练思路中的共性。

虽然我们并不能否认传统武术中对对象化思维的存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传统武术之经验心的提升,以实用为价值依据,注重方法摸索而轻视理论建构,大多无法上升到科学的高度。中国古代学问偏重于对过程的把握而轻视对结构的认知,偏重于对技能的掌握而轻视对理论的建构。固然,中国古人重视实用技术的功利意识并非全是缺点,但是,没有把实用技术提升到科学高度,毕竟是武术等传统学科领域的一大缺陷。中华武术的这种“尽其在我、操之在我”^[3]的提升经验心与彰显超验心的运动训练所培养出来的,必然多是一些“重质不重量、重技不重理”^[3]的神拳手。

对经验心的实际建设与对超验心的终极追求,共同构筑了中华武术的思想文化传统,从而形成了中华武术的风格特色。对超验心的终极追求与训练方式,即使在经验层面上,也至少有着心理训练的价值意义:从经验的层面来看,这种颇具传统特色的心理训练,确实有着较之现代的任何体育训练方式都更为彻底的从肉体到心理、从心理到心灵的放松效果,而这,对于现代武术训练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源自于兵家、道家、儒家乃至佛家的某些策略、方法、规范等,对于现代武术训练来说,绝对不会全是消极的,甚至可以说,其中的多数内容都是极有生命力的。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关注与审视中华武术的思想文化传统,并不意味着对这一思想文化传

统的完全肯定与全盘接受,而只是对这一思想文化传统的历史存在的积极理解与认真反省。

我们已经意识到,对超验心与超验智慧的确信,是传统武术乃至传统文化的一个异常鲜明的特色。就经验心与经验智慧而言,中国古人过于注重实用技巧而轻视理论思辨、过于注重对变化过程的把握而轻于对存在本质的认知、过于注重实践方法的策略性而轻于对原则与规则的遵循的文化特色,乃是传统武术无法突破工匠式文明而走向系统科学的主要原因。

传统文化与中华武术,可以通过经验心与超验心这两条线索得以较为清晰的会通。传统文化对经验心之提升的思想指导,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武术的训练,无疑是一种世俗层面的经验过程,然而,这一经验训练的最终目标,却是指向了对潜在于人身的能量无穷之超验心的彰显。在包括中华武术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经验心意味着智慧的不完善,而超验心则必然是十足完善的智慧。如果我们可以把“爱智慧”之哲学理解为一个追求完善智慧的过程的话,那么,中华武术的训练,也就不失为一个哲学的过程。我相信,传统武术的习练者们不计功利得失、数十年如一日地自觉训练的原始动力,必然会与这种带有某些宗教性质的训练思路有着或多或少的内在联系。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从传统文化之所以对中华武术产生影响、传统文化对中华武术的主要影响、传统武术的文化传统等方面来看,包括中华武术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在价值取向上是实用性的,在知识获得方式与知识内容性质上是经验性的,在认知方向上则既有与其他文化形态大致相同的主客对象性方式又有独具特色的主体内向性方式。这是关注中国文化发展的每一位学者都必须给予重视的。

4 对当今武术发展的思考

我们对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之关系的探讨,绝不是一个毫无现实意义的纯粹思辨。可以说,正是通过对中华武术与传统文化之关系的探讨,才使我渐渐明白了传统武术之所以能够使数以千万计的民间武术家们不计名利地修炼、津津有味地咀嚼、精神愉快地享受的魅力之所在。在我看来,传统武术的功能优势,并不是表现在技击、健身、表演等中的某一个别方面,而是表现在其所具有的技击、表演、健身、养性、自娱等功能的复合性,从而使传统武术的习练者能够在相对简捷的运动中一举多得;传统武术的精神魅力,并不在于其对所谓的“高、难、美、新”等技术规格的人为设计,而是在于其简单朴实的动作运动中所内含的文化思想。传统武术是一种自我娱乐与自我享受的运动力。传统武术家们在朴实简单的动作运动中,通过一种“无之无化”的超级心理训练,精神愉快地获得了技击、表演、健身、养性、自娱等多方面的效果。习武者在训练过程中所获得的,是一种难以言表的内心愉悦;通过训练而得到的种种外在评价,对习武者来说,绝不是最为重要的。正是其在功能优势与精神魅力方面的特征,传统武术有着远大于现代竞技武术的吸引力,而成为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大众化运动项目。

当今的竞技武术,是远离于普通的老百姓的;当今的武术比赛,无异于孤芳自赏。我并不反对甚至应该说是非常高兴这种蕴含着崭新价值取向的竞技武术形式的出现与发展,但却十分担心中华武术的全盘竞技化。从无数武林中人无奈的抱怨与感叹中可以看出,历来是多数老百姓之运动的中华武术,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尚未坠落到应该被全盘抛弃的地步。从这种多数老百姓的运动中分化发展出一种少数专业人士才可以参与的新运动形式,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其全部精英化。我们无法否认中华武术的发展在民间甚至在专业领域的极度萧条,我们无法再去回避这一极为严重的问题。中华武术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彻底地反思一下中华武术的文化传统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传统武术之所以能够长久流传下来的真正原因吗?

在我们发展中华武术、在我们面对众多的武术流派与拳种时,我们必须大致清楚我们应该重点继承什么与改造什么。在我看来,传统武术以超验心为目标的超级心理训练思路,各种超级心理训练的方式方法,各种提升经验心即改善、提高具体的动作、技术、战术等的训练手段,等等,是我们必须认真地加以继承和发展的。我们必须使传统武术这一雅俗共赏、老少皆宜、功能多样、自娱自乐的运动形式得以广泛的流传,我们必须使传统武术所固有的文化魅力得以完好的保存。不可否认,现代竞技武术之出现对于中华武术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功能单一、目的明确、思路清晰的现代体育项目,虽有颇多传统武术不可替代的独到之处,可无论如何,也是远远不能整体地覆盖传统武术的。当今世界文化的大交融,倡导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绝不是要以西式的现代化来取代一切古老的传统。更何况至今的传统武术自身仍然蕴含着强大生命力。我们应该深刻思考传统武术之所以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原因,我们必须认真关注传统武术的多功能性、自娱自乐性与宗教魅力。

任何时期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发展,都应该有一个相对成熟的、最适宜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理念的支撑与指导,否则,这种文化形态的发展必将导致人的异化而使这种文化形态丧失最基本的生命力。对传统文化与中华武术会通的研究,并非已经确立这种基本的文化理念,但是,在笔者看来,它毕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因为这是对武术文化传统所蕴藏的巨大惯性的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

参考文献:

- [1] 李泽厚. 历史本体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9.
- [2] 任继愈. 天人之际[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78-180.
- [3] 牟宗三. 中西哲学三会通十四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4;14-15;90.

[编辑:李寿荣]